

八八自述：在学问与生命之间

郭齐家

我们生活在一个感恩的时空里。我生于1938年，按虚岁说今年是88岁。回想过往，我既要感恩祖辈、父母和家人的养育之恩，感恩他们为我系好了“第一粒扣子”；也要感恩老师的栽培之情，感恩他们让我明白了“师严而道尊”；还要感恩我的学生和朋友们多年来给予我的无私帮助。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得以在有限的人生经历中获得无垠的生命价值，透过对中国教育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用学问滋养生命，用生命践行学问，在“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之间安身立命。晚年，我更是有幸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我坚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指引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躬逢盛世，充满喜悦，我衷心感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感恩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一、“第一粒扣子”——我与我的家庭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小儒商的家庭。据说我的祖上有耕读传家的传统。我的家住在湖北省武昌市（现在是武汉市武昌区）巡司河畔武泰闸到新桥之间的板厂街。家庭生活主要依靠从湖南运木筏、毛板船做些木板寿材生意来维持。

我的祖父在湖北省武昌高级商业学校（清末时叫“武昌甲种实业学堂”）毕业后，曾做过湖北美术高等专科学校总务科的负责人。为了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祖父回家做木板寿材生意。他在武昌新桥、八铺街、板厂街一带有些声望，属于社会贤达，是当地慈善机构“至善堂”的负责人之一，还当过保甲长。我祖父是一个爱国的人，在抗日战争中武昌沦陷之后，日本人要他做武昌市商会的会长，他坚决不干，并蓄须明志。

武汉市档案馆至今还留存着我祖父当年拒绝日本人的这封信件：“敬启者顷接：贵会函笺召开第一次整理会议，本拟届时参加，唯因常务整理委员一职，关系武昌市商会前途发展甚大，非有学识才能暨达练商情者，不克胜任斯职，厚自知无此才能，若滥竽充数，实属有误会务，除呈报市政处，恳请辞职外，相应函请贵会另选贤能，以便整理会务，不胜感荷，此致。武昌市商会整理委员会郭子厚启 十二，廿四。”这封80多年前的信体现了在当时日寇侵略之下，祖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气节，也反映了当时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民族大义。

为了安全起见，那时我父亲就设法把我祖父安排到汉口的法租界里躲了起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之后，我祖父才继续做木板寿材生意，其间也做过粮食生意。我父亲兄妹八人，父亲排行老大，从小就要出去谋生，十四五岁就到汉口当学徒，后来在汉口匹头号布店任店员、副经理、经理。应该说我祖父、父亲不是精英，而是生活化的民间下层儒商。他们都遵守儒家的思想道德，

作者简介：郭齐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5）。

譬如诚实不欺、公平守信，而且还热心公益、乐施不倦。在我们晚辈的成长中，他们总是以仁义忠信来教育我们。

我们郭家的家谱，上下五代的辈分依次是按照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正修齐治平”排列。祖辈是“正心”的“正”字辈，父辈是“修身”的“修”字辈，我们兄弟这一辈应是“齐家”的“齐”字辈。祖父本来按照“礼义廉耻”的顺序给我们兄弟起名字。这样，我大哥叫“郭齐礼”，二哥叫“郭齐义”，但不幸的是我二哥“齐义”在我出生之前就夭折了，我本是“老三”，就不好继续按“礼义廉耻”的顺序了。我祖父说干脆就叫“齐家”吧！下面几个弟妹的名字也是按“智仁勇”“娴淑”这类儒家文化词语起的。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前夕（1938年10月）出生的，正值日寇施行“武汉大轰炸”之际，形势格外紧张，我父亲不得不在汉口法租界租了一间小屋，好让我平安降生。我母亲由于过度劳累、颠簸、紧张，产后大出血，昏厥过去，险些丧命，我真所谓“生不逢时，年少多难！”我两岁时，不幸又得过一场大病，大概是由痢疾转成了伤寒、霍乱，病得很重，当时又无医疗条件，在家里躺在地上四十多天，家里已经准备了小棺材放在旁边。我的曾祖母、祖母、母亲三代长辈日夜守护陪伴，不时地用小勺往我嘴里喂水，就靠这一滴一滴的水挽救了我奄奄一息的小生命，我真是感恩家人的关爱，我终于闯过了难关，活下来了！

我们郭家的孩子，无论是我的小叔、小姑，还是我们兄弟姐妹，在上小学前，祖父就教我们认方块字、学算术、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上小学之后，除了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外，祖父还要求我们做家庭作业：每人每天写一张大字、一张小字、十道算术题，还要读书。先读学校发的国文教科书上的课文，读完后，祖父还叫我们读课外书籍，除“三百千”外，还从“四书”、《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中挑选一些内容。祖父是一位有威严、有经验的家庭教师，我们从小就敬重他老人家，如果他老人家有事外出了，就委托小叔、小姑或我的大哥代管，充当家庭教师的助手来辅导我们。我后来长大了，小叔、小姑、大哥也都先后上中学了，我就也有机会当小先生，做祖父的小助手，协助祖父管理弟妹做好家庭作业。

我父亲忙于在汉口经商，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所以经常教导我们的机会较少，即使这样，父亲也对我们十分关怀。我父亲每次回家，第一个要看的是他的奶奶，即我的曾祖母，他十分孝顺地送上他的问候，一般都要带礼物或小红包。第二个要看的是他的父母，即我的祖父母。逢年过节，初一、十五，我们家都要敬香，我们家有一“神龛”，上面供奉着佛菩萨像以及我们郭家祖宗的牌位。我父亲回家后，总是要向“神龛”敬香磕头的。这些都对我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时他也把我们带到汉口去玩，在汉口匹头号布店住上一两天，不过这种机遇很少，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经济条件所限。记得有一次他把我和大弟带到汉口去玩，一边玩一边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他说：“一个人最怕的是沾染了嫖娼、赌博、抽鸦片这些恶习。”那时候我们虽然还不到十岁，这些话都深深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之中。

我的母亲出身于大家闺秀，从小识文断字，德言容功，克己奉人，与人为善。她是郭家孝顺的大儿媳、大孙媳妇，也是贤妻良母、治家的能手。母亲常对我们说，要孝顺长辈，如果家里只剩下一碗汤，先要端给曾祖母、祖父母，让长辈们享用。她的人缘很好，常帮助街坊邻居，周济穷人，街坊邻居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嫂子”。乞丐讨饭的来了，如果家里只剩下半碗饭，也必让给讨饭的人吃。她操持我们这个大家庭，生活很辛苦。白天要操持全家的吃喝，伺候两代的老人，要给家人、孩子和做寿材的工人师傅做饭，晚上在清油灯下，为我们全家老少，尤其是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缝缝补补，纳鞋底、做针线活，有时竟通宵达旦不能休息。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位主妇，是一家人的福气。

我们兄弟姐妹有这么一位慈母，是我们一生的幸福。

其实一个家庭就是一个民间私塾，就是一个家庭学校，父母亲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母亲教管我们多一些，她是“生活老师”兼“班主任”。祖父是我们家庭学校的“校长”兼“老师”。祖父对我们孙辈很宽容，因为那时我们还小，不大懂事，他老人家很少对我们讲人生大道理，但对我的父辈，比如叔叔姑姑们是严肃的。我的小叔去世后，婶婶从小叔留下的旧日记本中找到了祖父教导他的一些话，整理了一篇“修身格言”。其实这些“修身格言”是我的祖父继承了祖上的传统对我们全家的教导，也可以看作是我们郭家的“家训”。

“大丈夫，成家容易；士君子，立志何难。进一步，自是平安；让他三分，何等清闲。青山不管人间事，绿水何曾说是非；有人问我红尘事，装聋作哑总不知。须交有道之士，莫结无义之友。饮清静之茶，戒色花之酒，开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恃富欺贫之人，不可近他；反面无情之人，不可交他；不知进退之人，不可说他；轻言寡信之人，不可托他；酒后无德之人，不可请他；时运未来之人，不可睬他；不识高低之人，不可理他；来历不明之人，不可留他。曰：说我、羞我、辱我、欺我、毁我、笑我、量我，我将何处他？我只好容他、避他、怕他、恐他、随他、尽他、由他，待过几年看他。太上老君曰：‘福祸无门，惟人自招，善恶有报，如影随形，天神共怒，国法难容，近报自身，远报儿孙。’识破之情，争什么气？不孝父母，修什么道？不遵圣训，读什么书？不惜光阴，勤什么学？不敬长辈，教什么子？不勤耕作，种什么田？不讲道德，做什么人？心肠不好，念什么经？暗计害人，朝什么神？奸诈虚伪，求什么福？不忠不孝，求什么名？急不相济，是什么亲？困难不扶，交什么友？识破乾坤，认什么真？行善是福，作恶是祸，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天然的道理。今天不知明日事，人争闲气一场空。看仔细，深悟彻，既能免罪消灾，也能益寿延年。”

201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家风家教是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第一粒扣子系好了，衣服就顺了，第一粒扣子系不好，衣服是歪斜的。我的一生都受益于这“第一粒扣子”。

二、“师严而道尊”——我与我的老师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就进入了武昌保安街小学（曾改为“武昌四小”），这是一所老学校，我的叔叔、姑姑和哥哥都上过这个学校，老师们很敬业、很爱学生，也比较有教育教学经验。学校的老师对我们家的情况也很熟悉，都认为我们郭家的孩子很老实、很用功。

1950年9月，我考上武汉三中（后改名为“湖北教育学院附中”“武汉市九中”），这个学校虽然是新建的学校，但老师很负责任，很多青年教师有活力，积极性高，这个学校就在武昌张之洞路紫阳湖畔，距离省体育场、省图书馆很近，我的初中三年就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

1953年9月，我考上了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高中部，这是湖北省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学校有“八大金刚”——八位德高望重、名声显赫的优秀老师，在这“八大金刚”带动下，全校教师整体水平很高，教风学风很好。由于我对这些老师师德的感恩和崇敬，我在高三毕业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立志做一名优秀的教师。

1956年8月，我收到了北师大教育系的录取通知书。收到通知书的第二天，家人就给我筹了一点钱，然后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记得开学典礼时，我第一次见到陈垣老校长，他是著名史学家，像一个老神仙一样，当时我心里很震撼：“这就是大学啊，这就是大学的先生啊！”

大学一年级的主要任务是听老师讲课，我记得当时是黄济老师教我们“教育学”，张厚粲老师教我们“心理学”，另外还有“人体解剖学”“中国革命史”“中国文学”等课程。这些老师都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大学者，比如，黄济老师是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他自幼就读于私塾，通晓“四书五经”，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所以他讲授教育哲学不是照搬西方的观点，而是处处闪烁着自己独特的东方智慧；张厚粲老师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孙女，是新中国心理学科公认的奠基者与带头人，行为独立，言谈豁达，热忱真诚。从懵懂的高中生到孜孜求学的大学生，这些老师们一下子把我带进了教育科学的殿堂，一直到现在，奠定了我一生治学与为人的基础。

好景不长，从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就来了，从1957年的“反右”到1958年的“大跃进”，大学二年级这个阶段我就没有系统学习什么东西了。到了1959年春天，我们又回到课堂去，恢复了一年级时候的学习劲头。这个时候我已进入大学三年级，我们重新开始了专业课的学习。朱智贤先生给我们讲“儿童心理学”，另外，教育史教研室的毛礼锐先生、陈景磐先生、邵鹤亭先生、瞿菊农先生这四大教授给我们讲“中国教育史”，王天一老师给我们讲“外国教育史”。

四年大学本科学习期间，虽然受到“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和干扰，但由于北师大教育系的教师整体水平和学生的整体素质比较好，我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专业的训练。1960年7月，我毕业后留任任助教，继续在教育系学习，继续向老师们请教。

1961年，当时中宣部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中宣部周扬副部长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作了动员报告，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促进大学文科的建设和发展。这次会议决定北师大教育系编写《中国教育史》教材的任务。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中有了一批有名的教授，如邱椿、邵鹤亭、毛礼锐、瞿菊农、陈景磐等。北师大党委和校领导根据中央文科教材建设会议的精神，指示教育系一方面组织力量编写《中国教育史》教材；另一方面，决定在教材编写的基础上，招收“中国教育史研究班”。

由于几位老先生忙于编写教材与招收培养研究生的重大任务，他们都需要助教帮助做些助手工作，如借阅图书资料、组织开会讨论，以及联系沟通、资料抄写整理等事宜，同时他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给本科生上课了。于是，我们这几个年轻助教就要充当老先生的助手，协助他们做些琐碎的事务工作，同时还要承担本科生的“中国教育史”的教学任务。我刚毕业不久，马上要给本科生上课，这就叫“赶鸭子上架”。

由于压力大，我思想格外紧张。这一段时间，老先生们给中国教育史研究班上课，我只要是能挤出时间，都尽量去听这些课，并认真记笔记；老先生开会讨论编写教材工作，我也尽量参加作记录，整理会议纪要，从中受到教益，增加了许多专业知识，提高了学科见识。

毛礼锐先生给本科生讲“中国古代教育论著选读”，我当他的助教，协助答疑、批改作业等。毛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在教育基本理论、中国教育史与西方教育史等领域均有独到的贡献。他一生仁慈和蔼，豁达乐观，勤勉好学，治学严谨，为建立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和培植教育史专业教学与学术研究队伍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我后来跟毛先生的关系特别亲密，他的夫人去世后，我经常去看望他。“要让他优柔从容自己去求心得；饱读书卷，自己去确定趋向。要好像浸渍在江海之中；好像受到膏露的润泽；对于书中义理就好像冰块溶解一样地消释，没有丝毫疑惑，而内心又感到和悦，觉得一切道理都很顺当，这样才可以算是好学的了。”这是几十年前我当毛礼锐先生助教时，他在我试译《朱子语类》中引用杜元凯一段话上圈圈点点，改了又改，留下的珍贵笔记。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张破旧的草稿纸夹在一本破旧的讲义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真是令人感

慨万千、回味无穷。

瞿菊农先生在编写教材过程中需要一个助教，我也主动去给他当助手。瞿先生承担的任务是“宋元明清”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我也向他请教。瞿先生把他写的讲稿和发表的文章给我看，他还给我开了一个书单，让我找些书看。我按图索骥，在图书馆一一查询，这个书单我到现在还一直保留着。它是历史的见证，恩师的传道授业体现在这张发黄的“草稿”纸上。

我还到资料室找程舜英先生讨教“四书”和其他古籍，程先生家学渊源，国学功底很深，当时被错划为“右派”，不让搞教学，被安排在资料室整理资料。我刚毕业不久，专业基础、古文训练都不够，整天惶恐不安，在图书馆、资料室四处搜寻，但能救急的资料并不多，这时全靠程先生真诚地帮助我渡过了教学难关。先生手把手地教我，如《论语》《孟子》等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其实我的“四书”基础是程先生给我打下的，有了这一点基础，我讲“中国教育史”课程就有了一点底气。先生还把太老师程树德老先生的《论语集释》送给我。现在我捧着太老师和恩师的学术著作，情丝缕缕，感恩多多，给我的晚年增添了无穷的活力和欢乐。

此外，我还到中文系、历史系、政教系去听一些相关的课，扩展专业知识，提升学术水平。我系统听了中文系陆宗达老先生讲的《孟子》。陆宗达先生是研究《说文解字》的专家，他的学问是从老师那里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从章太炎到黄侃，再到陆宗达，学术功底很扎实，我后来在珠海上课，就把当年听《孟子》的笔记抄给学生们的，我对他们说：“我现在讲的《孟子》，是五十多年前陆宗达先生讲给我们的，现在我传授给大家，这就叫作薪火相传。等你们将来成才了，继续传给你们的下一代。当我仰望星空时，我仿佛感受到我的老师在天上，像星星一样望着我。而将来有一天我与他们相会，我也会在天上看着同学们，给你们力量。”

我1960年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亲炙邱椿、毛礼锐、陈景磐、瞿菊农、邵鹤亭、张鸣岐、程舜英等老一辈中国教育史学者，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如果没有教育系教师群体的良好师德和学风，如果没有这群教师的传道授业、手把手地教我，我是很难打下“中国教育史”的专业基础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能顺利地恢复讲授“中国教育史”专业课，并于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宋明理学道德教育思想散论》等论文，1987年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教育思想史》，同年开始指导“中国教育史”方向的硕士生，1992年评为“正教授”，1995年评为“博导”，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老师们的指导，是他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师道尊严”。

三、“学问的生命”——我与中国教育史

1968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压力，我得了美尼尔氏综合征，十年之间无法正常生活、工作，几乎是每天都犯病，有时候跟别人说话，说着说着就不行了，头晕目眩，全身出汗，把别人搞得很尴尬。在饭厅买饭也是，人多的时候热气一烘，就病了晕倒在那里了。后来，在1978年年底，我有缘接触了郭林老师的健身方法，在家人的陪伴与鼓励下，不到两年间，身体渐渐恢复了，开始回到北师大教育史教研室工作。此后，我研读了《金刚经》《心经》等佛家经典。从那开始，我觉得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了提升。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资源，却长期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人们的误解，其实当我们剥去它们宗教的外衣，会发现其中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是超脱目前一般哲学理论与科学实验范畴之外的生命科学。我觉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背后还有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这种认知的转变也深刻影响了我对中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让我逐渐探索、发现和回归了中

国教育史“学问的生命”。1982年，我正式重返讲台，我讲课开始有了一点变化，逐渐从绝对的知识系统里超越出来，特别是对研究生的讲课，课堂讲授的知识要包含一种做人的东西，终极的目标是人文的关怀。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时候的学问研究其实已经进入生命探索层面了。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学生积极性高，听课认真，这激发了我对过去20多年中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的系统思考，为了给学生提供更丰富的教育史知识，我开始自己编讲义，将孔子、孟子等教育家关于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的论述分别列述，条理清晰、资料翔实地呈现在课堂之上。经过几轮教学修改充实，这些讲义成为我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教育思想史》，1987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1988年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1989年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优秀奖，又于1990年和2006年先后出版中文繁体版和英文版。2012年，我在教育科学出版社领导的关怀指导下，把中小学教师和普通民众作为主要读者对象，重新全面修订这本书，以“中国教育思想遗产”为总书名，拆分为“回望春秋战国”“回望汉唐”“回望宋元明清”“回望民国”四卷。

后来，我又陆续出版了相关著作，比如，编写《中国古代学校》（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商务印书馆1998年增订版）、《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商务印书馆1997年增订版），这两本书属《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参加《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编写工作，任第三卷主编，该书1998年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1999年又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参加编写《中国教育魂——从毛泽东教育思想到邓小平教育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1999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教育部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还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家》和《中国古代学校和书院》（北京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与人合著《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远古暨三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

晚年，我又在学生的帮助下，出版了自选集《教育立命之道与中华文化复兴》（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和《中国教育史》（上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后者是我过去半个多世纪在北师大讲授“中国教育史”课程的讲义精华，也是对当时毛礼锐先生等北师大一大批老先生们的思想观点的集中总结，这套书在2020年有幸获得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人民教育出版社已将本书版权输出到日本。

在“中国教育史”专业，我一共培养了硕士生17名（其中英国留学生1名）、高访学者和进修生10名（其中韩国、日本高访学者各1名）、博士生13名（其中韩国留学生2名）。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除了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指导以外，也十分重视对研究生如何做人的指导。我觉得做学问和做人是一致的。在研究生读书过程中，我总是在家庭关系、孝顺父母、遵守学校的规则等方面不断地提醒，也不断地考核他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会谈这些事情。我总觉得一个文化人、一个研究学问的人，如果在做人的基本问题上、伦理道德上没有处理好，将来是要出事儿的。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应该关心自己的学生，我一直把我的研究生和来进修的老师都当作一个家庭的成员来看待。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到这里来求学，我不能让他们感到寂寞和孤单。逢年过节，或者星期六、星期天，我都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聚一下，聊聊天、吃个饭，感受一下家庭的气氛和家庭的温暖。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教育，从中可以体会到家庭和做人的道理。真正的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是灵魂与灵魂的感召，是生命与生命的依托，要培养学生具有大

爱的胸怀、高尚的德行以及善念的种子。

我这一辈子研究“中国教育史”，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中国传统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启发人的内心自觉，教育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世精神，强调的是对自身的肯定，人不仅与天地相参而且顶天立地，追求“同天人”“合内外”（即殊相与共相统一、主观与客观统一）。在这种“天人合一”之中得到最高的理智的幸福。中国传统教育提出了“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并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表现出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与西方教育不同，中国传统教育不是悲观型的，而是乐观型的；不是“罪感教育”，而是“乐感教育”；不是消极无为、逃避现世的，而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不是以个体为本位，而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不主张离开社会和家庭，而是加强在家庭、学校及日常生活之中积累道德行为，加强自我修养，此岸即彼岸，“极高明而道中庸”；追求道德的“自律”，而不是“他律”。中国传统教育强调人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为仁由己”“自我修养”“自省”“自反”“慎独”，直到“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教育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向自身而不是向外、向上，不是等待外在的指令。重视其内在的力量，重内过于重外，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教育特色。

四、“生命的学问”——我与中华传统文化

1985年6月，当时中央教科所一位老干部韩达同志联系了“中国老年历史学会”，在其下设立了一个“中华孔子研究所”（“中华孔子学会”的前身），暂借了北京孔庙（后转到国子监）一间房作为临时办公室，聘请一些志愿者，联系了北京的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社科院以及山东、陕西、河北等全国各地的一些文科学者、教师，组织大家开展有关孔子、儒学、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张岱年先生是北大教授、知名学者，韩达多次拜访岱老，聘请他任“中华孔子研究所”所长。通过他又联系了周谷城先生、冯友兰先生、梁漱溟先生、张申府先生、贺麟先生、陈岱孙先生、邓广铭先生、季羨林先生、任继愈先生、白寿彝先生、赵光贤先生等著名学者。这些老先生形成一支雄厚的学术力量，成为“中华孔子研究所”的坚强后盾。

1990年后，“中华孔子研究所”更名为“中华孔子学会”，由民政部正式批准，教育部仍让中央教科所指导我们工作。张岱年先生由“所长”变为“会长”。汤一介先生还有其他几位学识渊博的先生任副会长。我们几位“副秘书长”也被提拔培养，成为“副会长”或成为各部的主任、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比“中华孔子研究所”影响更大，召开了多次国际和国内的学术讨论会，开展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如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儒学与现代性》《儒学与市场经济》等书。另外，还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宣传活动。为了推动青少年儿童读中华文化经典，张岱年先生在晚年还亲自题写“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系列丛书”。我担任编辑部主任。第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于200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共12册，内容丰富，都是选取精华、精粹部分，出版后对海内外影响甚大。编者在《后记》中说：“十万之文，经典精华尽在此；十二之册，圣贤法言萃乎此。唯愿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读之再读之，而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这是诸位老先生和国人的愿望，也是中华孔子学会为普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一份贡献！

岱老去世后，我们一致推举汤一介先生为继任会长，从汤老的人品、学问、资历、能力看，他任第二任会长是众望所归。汤老开会、讲课经常引用孔子的名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记得他最后一次开会也引用了这句话，这是孔子之忧，也是汤老之

忧！这是民族之忧，也是时代之忧！那次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老人家谈他的心中之忧！他晚年挑起了一副千钧重担——《儒藏》总编纂，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大文库《儒藏》，供世人阅读和研究，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汤一介先生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9年，中华孔子学会组织了一系列传统文化的讲座，汤一介先生安排我讲了一次，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社会上讲传统文化问题的。我从做学校教育到积极参与民间普及、弘扬中华文化经典，其实也是岱老、汤老这一批老学者支持鼓励的结果，我受到他们的精神感召。儒学的历史是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儒者以凡俗的生命铸就的。在岱老与汤老平易亲切的待人接物，以及他们凡俗的生活中，我体验到神圣性！我深深地感念他们对我的接引与提携，永远不能忘怀！

这些年，我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投入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事业中。诸多社会问题，其根源之一就在于人们在追求现代化的途中误入功利、浮躁的歧途，因此需要用民族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来安定心灵。一方面，我通过写文章，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如何用它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我直接通过讲课、讲座、编写读本、支持青少年诵读经典等社会活动，有意识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的课堂给学生讲，在社区给平民老百姓讲，在国家图书馆给部级领导干部讲，我们需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治疗现代人的心理疾病，通过经典来养志、养心、养生命，该我做的，我都要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生命，也是支持我们前进的力量。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论是谁请我，只要我能够讲的，我都可以去讲。我们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民族、为了文化，也为了我们下一代。因此我讲课不计报酬，不跟你讲价钱。

2004年10月，我的最后一届博士生论文答辩完以后，我就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整整待了十二年。我主要是面向全校开设文化通识课程，逐字逐句讲“四书”和《老子》《庄子》，每周四门大课，从晚上七点到九点，每门课100多名学生，我讲课的立足点是鼓励同学们回到“人”本身，回到“心性”的修养上，而不是仅仅关注知识层面，关心分数，关心考试，要关注技术背后的心性，不能一味地用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片面用科学技术遮蔽人文精神。除此之外还兼职其他学院的专业课，指导国学社，以及组织珠海市每年的祭孔活动等。

我每次上课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教室，拿着放大镜照着自己的书稿笔记，在黑板上写下满满的四面板书。学生们在心疼之余也有疑惑，问我为什么不把笔记打在课件上。我就说：“如果我不写黑板字，同学们就不会做笔记了，课件你们也不一定看的。如果写板书的话，我辛苦，你们也辛苦，但是你们会做笔记，会记住一些。还有，我也当练练字。我们不能总是靠打字啊，久了连字都不会写了，我们的文化载体不能丢失啊！中国汉字本身承载了巨大的文化基因与密码，一字一乾坤，一笔一画皆生命啊！”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在图书馆前晨练，久而久之，学生们也自发跟在我后头练，我就问他们：“你们这么年轻，怎么学我来锻炼啊？”学生说：“我看到郭老师身体这么好，也想跟着学一学，这样就可以回去教我爸爸妈妈。”我一听很感动，告诉他们这就是孝道，这就是中国文化，我们学传统文化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分数，而是要改变你的气质。所以我每学期第一堂课前都会说：“同学们，你们听完这学期的传统文化课，看看学期末的时候会不会回去为自己的妈妈洗一次脚。”还真有同学做到了！有一次，一个女生跑来跟我说，她回去给妈妈洗脚，没想到妈妈的脚这么粗糙，眼泪就掉了下来，妈妈看到女儿为自己洗脚，也流下了泪，母女的泪水在洗脚盆里汇聚，母女的感情也因此升华了。

2006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成立五周年之际，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先生捐献给学校一座孔子铜像，这是珠海现存唯一的一座孔子铜像。每逢9月28日孔子诞辰，我便召集我执教的法政学院、教育学院以及指导的学生社团国学社，联合珠海的社会机构，在孔子铜像前举行祭孔仪式。我每年的致辞都说：“我们中国也有圣诞节！这个圣诞节就是今天！长期以来，我们熟悉西方的圣诞节，不太熟悉我们中国自己的圣诞节。现在随着国力的提高，人民文化觉悟的成长，我们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感到孔圣人的诞辰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圣诞节！”

2016年，我结束在珠海的12年任教，返聘于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继续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希望能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们这一辈人老去了，希望在年轻一代的教师身上。我跟老师们分享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的理解，它是生命的学问，也是学问的生命，要以真诚对真诚，以生命对生命，强调时代的悲情和个人真实修养的感受。对它的理解与把握，取决于你对宇宙、对人类生命的关切所达到的深度。如果你没有“兴慈运悲，不舍众生”的理解态度，没有很强的历史文化意识，没有长期刻苦的修炼体验，是很难把握其思想义理之真髓的。只有坚持真实修炼的人，才能逐渐使自身与外界绝对的统一与协调，不离形体而又超越形体，不离自我而又超越自我，自我与非我完全统一，个体与绝对本体完全统一，他的心才能与宇宙光明逐渐打成一片，他才能获得无量的生命能量，产生不可想象的生命奇观。

2020年11月，我有幸获得“汤用彤二零二一年度学术奖”，评委会给我的颁奖词是：“古语有云：寿本乎仁，乐生于智。故仁者法天地而增寿，智者顺日月以养身。先生淡泊名利，通达智仁。执教六十余年，学贯古今中西。慷慨任气，磊落使才，修明心志，契合神理。木铎启而应者布乎四野，席珍流则从者遍于天下。原道宗经储能不匮，继圣立言薪火有传。盛德励耘，上善乐育。荣膺此奖，实至名归。”

这段话让我很惭愧。我非常普通，只是一个关心研究教育的人，只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应该说，每个人一生总会做一点事，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都是过去式。光环退去，我们都是一介布衣。百岁老人、我的恩师卢乐山先生说：“人活到老，要学到老，修养到老；人也只有学到老，修养到老，才能活到老！”我认为，自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自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回归自性，回归良心，这就是生命的学问。

（责任编辑 曹周天）